



三国如何演义——史家叙事与小说家讲史

■李庆西

三国故事国人几乎耳熟能详。从前,其传播途径主要是三国戏或饭后茶余的口传叙事。我这一代人读过《三国演义》的已不在少数(包括儿时阅读的小人书),现在读小说之外还有影视作品,还有年轻人喜欢的电玩《三国杀》之类。据说,现在有些年轻读者更热衷于寻踪溯源,从《三国志》和其他史著中去挖掘更多内容。这些形式各异的文本提供了许多自我复制和迭代变异的三国故事,足以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叙事迷宫。

我很早就着迷于此。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它足以笼罩许多人的精神世界,它以令人喜闻乐见的叙事内容,将某种古老的意识形态植入你的心灵。小时候听长辈说,吕布好端端的跪在貂蝉手里,后来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就是要斩去祸根。那时还不大能理解“红颜祸水”的古训,只是在书里找来找去没发现关公跟貂蝉有何牵扯,心想这肯定不是全本。许多年后才知道,三国故事有许多小说之外的文本,每一种讲法都有它背后的话语支撑。

自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之后,人们对中国古典小说逐渐有了比较深入研究。但具体说到《三国演义》,说说说浅都是绕着说,譬如做文学史的不愿意告诉你“尊刘抑曹”如何违背历史真实。历史不怎么强调人格与情感因素,如果说历史就是陈寿笔下的成王败寇。按照小说的叙事逻辑,你会怀疑那种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历史叙事,因为悲情和无奈之中有着某种精神诉求。小说里讲忠勇节义,讲“仁贼不两立”,过去尽被斥之“封建糟粕”,现在怕是又引为“传统美德”了(或既是糟粕又是美德,他们熟悉学术的辩证法),反正很少有人根据小说文本考察这套话语的伦理架构。

其实,五四一代文化人就不喜欢“忠勇节义”这套叙事话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论述中,对《三国演义》评价明显偏低。钱玄同将之视如《说岳》一类,认为作者“文才笨拙”。胡适基于三国故事能使妇孺皆晓的事实,称其“魔力”不小,却也以为文学价值不高,将之归入“二流以下”(《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不过就当日情形而言,自亦不必苛责前辈,那时候他们亟欲鼓吹文学改良(或是革命),寄希望于新文学,对此不遑细辨。

我最早的一篇学术文章是《曹

操形象的研究方法》,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一九八二年发表于《文学评论》。文章主要论证不能以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评价文学人物,当时有些学者要维护七十年代“评法批儒”给曹操指定的政治形象,究诘小说(毛本)如何歪曲了曹操。我觉得小说里的曹操符合角色定义,是书中塑造最好的艺术形象,我藉此论证文学的自身规律,是从艺术和审美角度立论。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理论与批评亟欲摆脱政治束缚,对文学本体的关注亦是一种学术风气。

以后很长时间,我没有再写过有关《三国演义》的文章。不过隔一两年会重新翻阅这部小说,只是兴趣而已,当然我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不止这一种,出于兴之所至的阅读自然不是学术研究的意思。我知道,真正搞古代小说研究的多半不会恪守文学本体,那种学问大抵在文本之外,自亦不必沉湎于文本解读。但我有时会想到小说的意义生成,想到叙述与叙述对象的关系,想到《三国演义》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对历史的重述与误读……

过了二十多年,我才意识到,完全恪守文学本体也是一种局限,因为《三国演义》这样的讲史小说本身不完全是文学文本,亦须从历史和伦理的角度去认识。而且,这部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很复杂,不仅对东汉末三国的历史状况,它所表达的东西也带有三国叙事文本衍变过程以及小说成书的历史因素。

岁月老去,思绪散逸。胡乱地想来想去,倒是不断开文本解读的路径。

十年前有一阵重读《三国演义》,开始关注过去未予重视的另一个视角,也即《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引史家叙事。当然,与三国相关的正史还有《后汉书》《晋书》和《资治通鉴》等(另,《宋书》天文、符瑞,五行诸志记述的休咎事验,差不多有一半属于这一时期)。从这些史著看三国风云,感觉像是又打开了几扇窗子,眼前出现许多异样的风景。史家叙事和小说家讲史各具要旨,但此中的差别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关键在于真实或是虚构,而是各自表述中所传递的历史消息。在互文见义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不同的三国叙事自有不同的意图和策略。

汉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与阉宦势力的斗争是一个大事件,但小说将何进描述为刚愎自用的颞颥角色,整个过程也只作为引出董卓的铺垫性情节。可是从《后汉书》本传

看,何进决意革除“天下所疾”,很有一番摧陷廓清抱负,他与太后百般周旋,甚至不惜站到自己家族的对立面。作为一个励志进取的失败者,小说却没有把他写成悲剧人物,为什么?因为在小说语境中何进的外戚身份跟十常侍一样令人厌憎,这里不能忽视叙述者的情感与立场。其实,当初的情势跟后人的认识不一样,汉末自党锢之狱以来,外戚与士族结盟已形成一种政治传统,如当年窦武、陈蕃便是。

小说与史传对同一人物或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往往包含不同的伦理认识。如,《三国志》叙刘备战场上屡屡抛妻弃婴,让人一眼看出嘲讽之意——其未能整齐阖内,有违风教之旨,何论“治国平天下”?小说家却藉其家室屡经丧乱的史实,刻画刘备对女色不甚用心,更于忧患中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大家之风。史家着眼于修身齐家,小说家却道“妻子如衣服”,似乎置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语境。再如,曹操杀吕伯奢之事,《三国志》的隐匿态度与《三国演义》之精彩描述恰成对照。此事见诸裴注所引王沈《魏书》、郭颁《语》和孙盛《杂记》,并非后世小说家之结撰,陈寿撰史不取此节,自有掩饰回护之意。《三国志》记述曹操行事往往托于目标与纲领之大义,顾不得些许“不仁”之事。曹操杀吕之际尚为国家奔命,小说里陈宫碍于曹操卓卓之义,未能下手除去这“狼心之徒”,却想:“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若弃而他往。”京剧《捉放曹》便是抓住陈宫这句话大做文章,戏中一迭声的“悔不该”,实是纠结于心的“仁”“义”之辨。

这样的例子很多,无须逐一列举。作为“讲史书者”,从来元“说三分”到杂剧传奇乃至近世之三国戏,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既然以讲述历史的方式娱乐大众,自有被某种约定话语习俗的叙事观念,亦自有别于晋宋史家。

确实,不能简单地将《三国演义》定义为文学作品,应该说这是一种跨界的叙事文本,或许可以说是带有文学性质的普及版三国演义编年史。鲁迅批评《三国演义》“实多虚少”和“描写过实”(《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就是说它不大像小说。鲁迅辨析宋代“说话”的若干分类,简约地归纳为“讲史之体”与“小说之体”两种体式——从根本上说它们本来就是两路。南宋钱锺人吴自牧记述当日临安市井“说话”概

况,关于“讲史书者”有此具体说明:“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梦粱录》卷二十)毫无疑问,《三国演义》正是这条路数。不过,考虑到叙述方便,我在自己的文章里还是按从众原则将《三国演义》称作小说或讲史小说;不仅是作为区分史家叙事的一种标识,而且我并不否认这部作品的文学要素。不大像小说的小说,亦未必不能是伟大作品。强调《三国演义》的叙事特点,主要是开通与其他史家叙事进行比较的一个角度。

从各种历史书写到戏曲小说之重述,三国叙事的诸多文本可以说是一种累层地造成的文化堆积,其中不同历史层面携有的政治伦理态度以及所塑造的人格形象,往往最后在小说里形成叠加效应,这也是小说叙事中某些悖谬现象之由来。当然,《三国演义》相比史传有着更多的虚构和想象空间,亦自有其审美取向和叙事技巧。譬如,虽败犹荣的蜀汉悲剧,集忠勇节义于一身的关羽其人,诸葛亮“六出奇计”和姜维“九伐中原”的辉煌战绩,便是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构筑另一种历史存在。

其实,三国只是一个短暂的割据时期,即按《三国演义》叙事时间不过百年历史,而史学界往往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作为这一时期的开端,并以280年东吴灭亡为结束,前后正好一个甲子(即如万斯同《三国志年表》起讫年份),如果视作东汉、西晋之间的一个空档(从献帝禅位到司马登基),其间仅四十五年。我在阅读和写作时,想到过这样几个问题:这个历史过程何以在国人心目中显得格外重要?同样是政权割据的南北朝长达一百七十年,为什么人们对那一时期的认知却却远不如三国?显然是因为三国有一套妇孺皆知的叙事文本,也即《三国演义》,还有至今仍在人们记忆中的那些三国戏。可是,这段被叙述的历史并非非罗的汉唐盛世,亦非两宋时期的人文辉煌,原因或许并不在于历史本身,而是叙述建构的某种想象和情感,那是一个被毁灭的儒者的理想国,那些故事里充满正义与悲情,智谋与权变,以及至今依然困扰国人的种种伦理语境。

陈寿撰《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虽不尽合理,体例上亦显得别扭,却是代表了某种历史共识,那就是企图寻找一种统辖性的存在方式,“小说之体”两种体式——从根源上产生多种释义的历史记忆,用钱穆的话来说,就是“国家民族之传

成”(《国史大纲》第三遍第七章)。其要义在于,将春秋战国以来裂土分封的贵族专制逐步改造为具有行政意义的郡县制度,这样政治上似乎顺理成章地纳入儒家先贤设计的礼治之道。可是汉末豪强纷争的乱局打破了这种大一统,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战国以前的局面。顾炎武有谓战国时“邦无定交,土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其实三国时期亦如此,这种情形在《三国志》叙事中自有充分体现。由于汉室已是要被革除的对象,在魏晋史家眼里,只有抽象的圣王之道,并没有具体的“国家”观念。但是《三国演义》的叙事话语却完全更新了士族集团的政治伦理,从异性结契到家国大义、刘关张和诸葛亮的故事勾勒了君臣之道的理想模式,亦在想象中建构国家意识的终极信念。应该说,这是解读三国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陈寿撰史带有某种“元叙事”的理论预设,以为历史书写应符合具有某种演化轨迹的构想型式,成王败寇的历史消息自然包含王朝兴替的伦理逻辑。然而,如果将历史理解为对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抑或包括共同的“想象”),作为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则有另外一种叙事意义。原初的记忆可能湮漫不清,史家叙事亦不无想象成分,小说家可用自己的想象去修正前人的想象,以填补历史记忆。譬如,《三国演义》将“匡扶汉室”作为大目标,衰靡不振的汉室就成了光荣与崇高的象征。在国家意识作用下,放大和凸显了忠勇节义的英雄气概。小说家之所以同情弱勢的蜀汉一方,并非出于文学史家所谓“刘姓天下”的正统观念,而是痛感于宋元以后中土沉沦的现实悲况,代入了被凌辱者的抵抗情感。沉沦之中重述恢复汉室之旧梦,明显是召唤国人之历史记忆,强调华夏民众之国家认同。逆境奋起的英雄叙事对于饱受欺辱的民族来说意义重大,这是《三国演义》对于国人心灵建构之所以产生重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由于这个时期呈现一种多极的格局,各方势力大有纵横捭阖的活动空间;在《三国志》和晋宋史家的叙述上原本不乏战国纵横家的诡谲套路,在小说中更是表现为英雄主义与机会主义互为表里的特点。最明显的是智谋的广泛运用,这也是小说最主要的虚构成分。那些极富想象的计谋,一方面作为对英雄叙事的补充和增益,同时也以手段诡诈抵消了赋予行为本身的道义内涵,构成某种值得探讨的叙事悖

谬。在国人的记忆中,从田忌赛马的古老寓言开始,智谋就成了弱者的取胜之道,至少藉以获得某种精神优胜。从王允连环计到周瑜打黄盖,从诸葛亮空城计到姜维谋结孙权,那些故事情节让人津津乐道,亦无疑印证了某种智谋崇拜的文化心理。

总之,从历史到文学的三国叙事浓缩了一种精神建构,其中的话语衍变很值得研究。

说实在,过去并未想到要专门去研究三国和三国演义,当初大学毕业论文拿曹操作题目是有某个偶然的机缘。关于本书的写作,最初并没有一个完整思路,早先的几篇可以说是出于某些零散的想法,如《十常侍乱政》《白门楼记》《“捉放曹”及其他》等,写作的间隔都有两年多时间。起先并没有打算写成一个系列。自二〇一五年二月,《刘备说“妻子如衣服……”》一文在《读书》杂志发表之后,该刊编辑卫纯先生建议我开设一个“老读三国”的专栏,从那时开始对自己的书写对象有了整体考虑,也加快了写作节奏。

二〇一六年年底,《读书》杂志编辑出版“读书文丛”,将我的《老读三国》列为一种,其中收入先期完成的九篇关于三国的文章。此后这个系列并未搁笔,卫纯曾打算以后再出增订本,补入后来写成的篇什。但现在整个系列的篇数和篇幅都是《老读三国》的三倍之多,我觉得作为增订本重出不是很合适。所以,现在另行编纂,仍由三联书店出版。

收入本书的文章共二十七篇,分别叙及三国时期主要人物、事件和人文政治现象,并有专文讨论相关地理、职官和吏治风俗诸事。这些文章除了一部分刊于《读书》,其他发表在《书城》《上海文化》和《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这里要感谢那些杂志和报纸的编辑们,他们也是我写作的动力。当然,特别要感谢卫纯先生,没有他的鼓励和督促,恐怕不会有这本书。

黄子平兄慨允为本书作序,吴彬女士担纲责任编辑,使我深感荣幸。我与他们分别相识于一九八四年,在奥威尔预言不祥的年份,我们相期于光明。几十年来相隔天南地北,好在能以文字相聚,倘如白发渔樵浊酒把盏——“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三国如何演义)》,李庆西著,三联书店2018年10月出版)

魏了翁的学术思想是湘文化的重要资源

■张京华

今年,是先贤魏了翁诞辰840周年紀念。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学者称鹤山先生。四川邛州蒲江人。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第二人及第,历官签书剑南西路度判官厅公事、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知嘉定府、汉州、眉州、泸州、潼川府、权工部侍郎。黜靖州,复职进宝章阁待制,为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礼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事兼江淮安抚,知福州,终福建安抚使。年六十三卒,谥文靖。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权臣史弥远当政,魏了翁被以“封章谤讟”“朋邪谤国”“欺世盗名”罪名,落职夺三秩,谪居靖州,前后七年。

魏了翁的思想价值和学术地位,可从六个方面加以分析。

魏了翁是两宋重臣,政见卓犖。他所处的南宋时代,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权臣相继,内擅国柄,外变风俗,纲常沦散,法度堕弛,贪浊在位,举事弊蠹,不可殚覆。”魏了翁念及于此,应诏上章,疏列万言,先引故实,次陈时弊,分别利害,契若白黑。宋理宗读之感动,即于经筵举为成诵。还朝六月,前后二十余奏,皆当时急需。

魏了翁长于吏治,务实实用。他知汉州,以化善俗为治。知眉州,复

蠖螟堰,筑江乡馆,利民之事,知无不为,治行彰闻。知泸州,葺其城楼榭雉堞,增置器械,教习牌手,申严军律,兴学校,蠲宿负,复社仓,创义冢,建养济院,居数月,百废具举。

魏了翁是当世著名的才子,才华过人。《宋史》称魏了翁少年时,“年数岁,从诸兄入学,俨如成人。少长,英语绝出,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再览。乡里称为‘神童’。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元程端礼《送牟景阳序》说:“蜀文再变于魏了翁。”清人高度评价说:“其天姿本自绝异,故自中年以后,覃思经术,造诣益深。所作醇正有法,而纤徐宕折,出乎自然。绝不染江湖游士叫嚣狂诞之风,亦不染讲学诸儒空疏拘腐之病。在南宋中叶,可谓豁然于流俗外矣。”

魏了翁一生学术,根柢理学。魏了翁的学术、为人、政绩,和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积极健康,端庄大气,行中道,走正路,居于儒家学派的核心,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保持一致的。黄宗羲、全祖望著《宋元学案》,将魏了翁列为《鹤山学案》,并摘其《师友雅言》《鹤山大全集》《鹤山奏札》中精要,认为魏了翁是朱熹、张栻私淑弟子。魏了翁在眉州,“尊礼耆考,简拔俊秀,朔望诣学官,亲为讲说,诱掖指授,行乡饮酒礼以示教化,增贡士员

以振文风”,“士论大服,俗为之变”在潼川,“若游似、吴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门受业”。在邛州,服膺二居,“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燾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

魏了翁为两宋理学的正统化,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魏了翁与真德秀为友,相与推崇周程张朱,二人并称“真魏”。嘉定七年、九年,魏了翁接连两次上疏,最早奏请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赐爵谥,“示学者趣向,朝论赴之,如其请”。奏疏中,魏了翁重新勾勒建构了儒学的发展脉络,指出:“盖自周衰,孔孟没,更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无所宗主,支离泮涣,莫适与归。醇质者滞于占毕训诂,剪爽者溺于记览词章。言义理则流于清虚寂灭,论事功则鸩于权谋智巧。诬民惑世,沦于肌髓,不可救药。而[周]敦颐独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赜,建图穷书,阐发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际,示学者穷理尽性之归。使诵其遗言者,殆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而知之者所谓学,盖有不足于学者。于是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传,而圣学益以大振。虽三人于时皆不及大用,而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独盛于本朝,而超出百代。”魏了

翁《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说:“周元公先生自庆历间与程大友为友,二程子从之游盖防社。横渠张子则于二子而有闻焉,前倡后承,积百余年,而后其道大明。”《宋元学案》又载魏了翁说:“周子奋自南服,超然独巍,以上承孔孟垂绝之绪。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与疏通阐明,而圣道复著。”魏了翁又作《道州宁远县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记》《宝庆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记》,“只如宁远、营造,皆濂溪乡邑,皆某作记”。

魏了翁的学术思想早在宋代已经流传古朝鲜(别称鸡林)。影响东亚。王德文《注鹤山先生渠阳诗》说:“尝观古人立论论事,奋不顾身,其风节若可表厉斯世。逮夫处幽闲寂寞之滨,则悲愤郁,形于诗歌,有不能一朝居者。虽以屈贾韩柳,弗免此累。鹤山先生六载渠阳,授道著书之余,日以骚人墨客以诗相倡酬,春容暇豫,俨然有春风沂水气象,视魏公何如哉?渠阳之诗,天下传诵,鸡林亦争致之。其间用事宏奥,揽者不能尽知。”

魏了翁的学术思想遗产,十分厚重。魏了翁的学术著作,有《九经要义》,包括《周易要义》《尚书要义》《春秋要义》《仪礼要义》《周礼要义》《春秋左传要义》《礼记要义》《论语要义》

《孟子要义》,共263卷。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共109卷。魏了翁还精于书道,擅写行楷,有《提刑提举帖》藏于故宫博物院,《文向帖》藏于上海博物馆,又有墨迹见于宋本《注鹤山先生渠阳诗》中。近年已有学者出版《魏了翁年谱》《魏了翁评传》《魏了翁文学研究》,对其生平、学术有详论述。《魏了翁全集》的点校本新版也在整理中,很快将会出版。

魏了翁的学术思想是湖南的重要文化资源,在湖湘文化中占有极大的分量。“考诸近世,倡明正学以绍孔孟之传者,前后迭出,率在湖湘间。”从思想、学术的厚重上看,现在学术界公认周敦颐为湖湘文化的开创者、第一人,去年是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纪念,省内外对濂溪理学的思想和地位有热烈的讨论,道县濂溪故里的周敦颐诞辰千年庆典活动被上海社科院软实力研究中心评为影响中国社会的十大文化要事。王夫之是本省第二位文化名人,叶德裕论湘学曾说:“湘学肇于黉熊,成于三周,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明年是王夫之诞辰400周年纪念,有学者称,周敦颐、王夫之是湖湘文化的“双子星座”。而魏了翁比王夫之年代早,地位高,影响久,魏了翁对湖南的贡献和在湖湘文化中的地

位应当不在王夫之下。

魏了翁是湖南靖州乃至怀化市的第一个优秀文化品牌。“遁避三阶,窜投荆郢,七年去国,六载囚山。”魏了翁是最早对靖州的风土民情作了详细记录并加以赞赏的第一人,他说:“靖为天下穷处,其藿蔬又在峡郡下,而土风不恶,民俗亦淳,时和岁丰,则物贱如土。”他在靖州撰写的《渠阳集》,共18卷,其中《古诗》一卷,《书》三卷,《记》四卷,《序》《铭》《跋》各一卷,《墓志铭》七卷,诗文共计二百篇。他写的《鹤山渠阳读书杂钞》《经外杂抄》《鹤山先生渠阳诗》,在他贬谪期间已有抄本流传。《九经要义》也编纂于靖州。魏了翁说:“某自迁渠阳,山深日永,《易》《诗》《礼》,重下钝工,名物度数,音训偏旁,字字看过,益知义理无穷,而岁月易失。使非假以暇日,将虚此生。今未敢便有著述,且温旧读,以发新知。”《宋史》称道说:“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乃著《九经要义》百卷,订定精密,先儒所未有。”魏了翁在靖州创建了鹤山书院,作《鹤山书院院记》,宋理宗御书“鹤山书院”四大字面赐魏了翁。

总之,魏了翁研究在湖南具有绝对的意义和永久的价值。